

# 蘇俄與東歐的知識份子

尹慶耀

## 一

儘管共黨宣傳，它們是依靠工農大眾的力量，奪取了政權；然而事實上，知識份子才是它們「革命」的頭腦與心臟。根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共黨對於知識份子也特別加以警戒。目前，蘇俄、東歐的共黨政權，最担心的是其知識份子的兩大傾向：其一是自由化，其二是西歐化。大致說來，所謂自由化是從一九五六年克宮反史以後開始，隨着所謂「和平共存」及一九六三年以後「經濟改革」的爭論與實驗，其西歐化的傾向也日益顯著。

共黨一向把知識份子尤其是作家與藝術家，當作御用工具。史達林要他們作「靈魂的工程師」，黑魯曉夫要他們作人民的「砲手」，而蘇俄新政權也依然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藝政策奉為主臬。這在東歐也并無不同。不過由於時代背景的推移，共黨賦予知識份子的任務也有所改變。

平心而論，蘇俄之有今日，乃史達林奠其始基。然而，他過於偏重重工業的政策（這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因為蘇俄迄今并未放棄重工業優先），長期犧牲人民的生活；他以血腥整肅手段，澈底箝制個人自由，使官僚主義滲透蘇俄、東歐社會的每個角落，阻礙其文化與經濟的正常發展；他對附庸的無情榨取，激反了南斯拉夫；他明目張胆的擴張政策，引起了自由世界的警惕與抵抗……他的繼承者，既不具備與他同樣神化的權威，自然非改變路線不可。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在史達林喪禮的告別式中，馬林可夫就提出和平共存、和平競賽等口號，他又主張發展輕工業，以改善人民生活。黑魯曉夫當時雖加反對，但後來他不僅承襲了對方的衣鉢，且逐漸發展成「

蘇俄與東歐的知識份子

## 三和兩全」的路線。

黑魯曉夫反史，或許有不可告人的多種動機。但在共產主義的背景上，沖淡史達林時代那些恐怖、貧困、落後、暴力、擴張等色彩，另塗抹上一些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富足的顏料，為它的明天描繪成一幅美麗的畫圖，而把一切錯誤與缺陷歸咎於史達林，對外也披起一襲「和平」的外衣，當不失為動機之一。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他要求知識份子尤其是作家、藝術家，在宣傳上作他的砲手。

蘇俄新政權仍然執行「三和兩全」路線，并把黑魯曉夫時代已開始摸索的「經濟改革」，付諸實施。其主要重點在採取西方的若干經營方式，放寬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提高企業的自由與主動精神。這些都會遭受死硬份子的反對，因而又須要知識份子加以宣傳鼓吹。

東歐對反史反應熱烈，「經濟改革」尤在蘇俄之先，與西歐的接近也更較積極。於是，其知識份子本身自由化與西歐化的趨勢，也更加前進。

當知識份子們走得太快、太遠，甚至逸出軌道時，共黨政權乃不得不加以限制與干涉。知識份子與共黨政權的矛盾，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發生并發展的。

## 二

蘇俄青年詩人葉弗圖辛科（Evgeny Aleksandrovich Yevtushenko）堪稱反史的號手，然而在幼年，他也是個史達林崇拜者。他在法國出版之「早熟的自傳」裏，曾經追述史達林死亡當日的情景。大意說：一九五三年

三月五日，一項事件突然震撼了蘇俄全土——史達林死了。過去我從未想到史達林會死。史達林是我的一部分，他將和我們分開是不可理解的事。當時，人們中間呈現一種虛脫狀態，他們認為史達林一切都為大家着想，失去了史達林，人們就迷失了方向。全蘇俄都在啜泣，淚從心底流出，為了對將來心懷不安。我也和大家一樣的哭了。作家協會為了史達林的告別式，特別召開了會議，我永遠記得那個感人的場面。為了把「光榮獻給史達林」，大家手捧着自己的新詩，聲淚俱下地朗誦。連高大堅強的特瓦爾采夫斯基（Aleksandr Trifonovich Tvardovsky），也一面朗誦一面發抖。接着，他敘述了成千成萬的市民，因參觀史達林的喪禮而擁擠，而混亂，而流血……。

不僅在蘇俄，就在國際共黨尤其是共產國家，史達林也是一個最高的偶像。當這偶像一旦被打倒，被粉碎時，蘇俄的思想界尤其是青年知識份子，就難免迷惘、懷疑、混亂。東歐的知識界同樣受到震盪，波共機關報「人民論壇報」總編輯莫勞斯基（Morawsky），於參加俄共二十次大會聆聽黑魯曉夫反史演說返國後，立即著論掀起反史運動。同年（一九五六）六月廿八日波茲南暴動雖由工人引起，但導因則為知識份子之自由要求。而十月廿三日爆發之匈牙利反共革命，亦係由知識份子、學生、青年所主動。早在三月卅日，以匈牙利作家協會為中心的約五千名知識份子集會，要求反史并放逐匈共首領拉柯西，而會議的主席就是匈共機關報「人民自由報」的主席。革命經俄軍鎮壓失敗，卡達爾政權一時加強內部統制，但不久又放寬自由尺度。而其他東歐國家知識份子之要求自由，亦乘反史機緣而加強。

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廿二次大會，黑魯曉夫一方面排斥阿爾巴尼亞，同時再度反史。一九六二年蘇俄文藝界也出現了反史高潮，黑魯曉夫立排眾議，親自批准「真理報」於十月廿一日掲載了葉弗圖辛科的「史達林的繼承者」一詩，和十一月號的「新世界」發表了索爾傑尼欽（Aleksandr I. Solzhenitsyn）暴露史達林時代集中營生活的小说「伊凡·德尼索維奇生命中的一日」。然而，反史反到最後，無異是揭露共產社會的瘡疤；鼓吹「和平共存」的結果，使文藝界要求與西方的藝術形式「共存」（愛倫堡會如此要求），而藝術家們偏喜愛黑魯曉夫最討厭的抽象畫。十二月一日他參觀了莫涅齊畫廊的展覽之後，立即掀起文藝整風。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他在克里姆

林宮面對着六百名文藝界及其他知識份子，警告作家們不得專門暴露「黑暗面」，指責愛倫堡（Ilya Grigoryevich Ehrenburg）想和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平共存」，並且大罵抽象派畫家及其他作家、音樂家。

這次整風在西歐共黨中反應欠佳，已故義共首領陶里亞蒂公開聲言，不能「命令那些藝術家，詩歌要怎樣寫法，樂曲要怎樣創作，繪畫要怎樣描繪」。東歐共黨反應也不够熱烈。華沙的抽象畫滿坑滿谷，匈牙利不準備干涉藝術家創作自由，羅馬尼亞且以不追隨蘇俄整風為榮。正當蘇俄文藝整風進行中，捷克科學院於一九六三年五月主辦東歐文學家會議，提出重新評卡夫卡問題，不久卡夫卡的作品就走遍了鐵幕，包括蘇俄本身在內。卡氏作品之受歡迎，就因為其內容所描寫的恰恰像史達林時代的恐怖社會，正適合鐵幕人民的反史胃口。這並不是說東歐對知識份子完全放任，事實上限制、干涉甚至整肅事件，并未絕跡，而且它們也不斷警告說，「和平共存」不包括思想問題在內。至於在蘇俄整風中，它們不完全亦步亦趨，或許是要表示一下自己的獨立立場，而對於當時傳說中由伊里切夫所代表的新史達林主義之抬頭存有戒心，或者也是原因之一。

### 三

在「和平共存」策略推進的同時，所謂文化交流也隨之登場。一九五六年初，蘇俄藝術院長格拉西摩夫（Sergey Gerasimov）聲稱：「蘇俄歡迎外國藝術家來訪，同時願意協助本國藝術家前往世界各地」。前引黑魯曉夫對知識份子的講話中，曾直言俄共中央對蘇俄作家的海外旅行寄予厚望，一方面希望他們到各處看看，寫些有關各國勞動人民的生活，以及他們如何為反帝、反殖和為和平、自由、幸福而進行鬥爭的作品；一方面對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生活與鬥爭，予以正確的解釋。據我們所知，早在史達林時代，蘇俄作家巴甫連科（Pavlenko）就曾於一九四九年春，出席過美國文化、科學界召開的保衛和平大會，他回國後寫了一本美國印象記，報導美國「進步的」知識份子如何在與反動勢力鬥爭。俄共希望別的作家也和他一樣，去完成攻擊西方，宣揚自己的任務（蘇俄邀請世界左翼作家赴鐵幕，同樣希望他們在作品裏醜化資本主義，而美化社會主義）。然而，小說家涅克拉索夫（Ne-

Krasov)於一九六一、六二年旅行美、義之後，在「新世界」發表的旅行記「大西洋兩岸」裏，對美國的很多事物表示憧憬，當他在義大利被人問到爲什麼沒有看過世界有名的電影？爲什麼蘇俄某些作家的作品不能在國內出版？甚至有些共產黨員也問他，爲了對某些西方作家能够典型地表現時代精神的作品，也遲遲不能接受？他就感覺非常難堪。而屢次旅行國外的葉弗圖辛科，在一首詩裏表示：世界上存在着國界是一種不幸，他要把華盛頓、布宜諾斯艾利斯看清；雖然不懂英語，也想在倫敦漫步；站在巴士的踏板上，在巴黎街頭兜風。他在另一首詩裏又說：美國之黨和俄羅斯之黨，具有共同的語言。至於其他很多作家，也像黑魯曉夫所指責的，他們在國外，并不加意宣揚蘇俄國民的努力成果，而專門設法迎合資產階級聽衆的心理，講些他們喜歡聽的話！

東歐的作家們也可到海外旅行，而尤以自由化傾向顯著的匈牙利爲多。例如因一九五六年革命事件被捕，一九六〇年大赦獲釋的戴利(Tibor Dely)，即曾前往許多西方國家旅行。另一位和他命運相同的作家海伊(Jyula Hay)，於一九六四年秋獲准前往漢堡，商討他的劇本在西德拍成電影的問題。東歐作家們在國外說些什麼，比較少有報導。但據我們所知，匈牙利的作家瓦西寫過一首詩，題爲「刎頸之交」，詩中主人公想到一九五六年逃亡國外的人們，如今享受着富裕生活，還經常接濟留在國內的親友；而他是一個永遠忠於黨的匈牙利人，但永遠買不起一輛小轎車！由這首詩的內容想來，那些旅行國外的東歐作家們，不見得能完成共黨所希望的文化統戰任務。

然而，文化統戰工作是不能放棄的，於是蘇俄目前就抬出了蕭洛霍夫(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這位今年六十一歲的作家，會爲了在推行集體化運動時共黨幹部的暴行寫信給史達林，黑魯曉夫在前述對知識份子講話中，也會舉出蕭洛霍夫於一九三三年春致史達林的兩封信和史達林的回信，稱贊他如何對違反正義的暴行，採取了勇敢的不妥協的態度。雖然確如共匪所指責，當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時，他於三月八日在「真理報」上寫過：「父親，別了！永別了，親愛的終身都熱愛的父親！」那些話，但如前所述，這樣做的并不只他自己。事實上，在史達林生前，他住在頓河畔的家鄉，有二十年沒發表過作品。在俄共二十次大會中，他也參加了反史

行列。他抨擊過法捷耶夫(Aleksandr Aleksandrovich Fadeyev)和蘇爾科夫(Aleksey Aleksandrovich Surkov)在作家協會的領導方式，把一個創作團體變成了行政團體，指責他們的工作爲官僚主義；然而，他不像愛倫堡和特瓦爾采夫斯基那樣具有所謂「自由主義」的色彩。他是個愛國主義者，曾經斥責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齊瓦哥醫生」的作者帕斯特納克(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是「國內的白俄」。在今年三、四月間俄共第廿三次代表大會中，他大罵反動作家及其同情者。但在文學本身，他確有相當造詣，他的諾貝爾獎金獲獎(一九六五年)作品「靜靜的頓河」一書，是十七歲時創意、二十歲執筆，二十三歲時發表了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到第四部完結，費時十數年。由於他年事過輕，第一部第二部發表時，有人懷疑並非他自己的創作，而是剽竊了一位死於內戰的白軍軍官的遺稿。他是蘇俄作家中真正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第一人，共匪對他的批判，多屬有意歪曲(註)。他已於今年五月間訪問了日本，今後或將繼續訪問其他國家。他現今是蘇俄政權在文化交流中的理想代表，然而世界上却只有一個蕭洛霍夫。

#### 四

反史、文化交流促成了自由化、西歐化傾向，而「經濟改革」更爲它注射了興奮劑。

一九六二年左右，經濟困難籠罩了蘇俄與東歐，使得統治階層對史達林時代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失掉了信心，於是原已存在的「修正主義」經濟學家漸漸抬頭，逐漸擴大其影響力。譬如，布拉格著名經濟學家塞爾基著論稱：「和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同時，我們也接受了『計劃崇拜』。現今計劃經濟及其領導方式，業已動脈硬化，在現實情況下非常不合理。過去，我們一直相信從沒落的資本主義方面得不到什麼，可是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革命比我們快，應用得徹底，於是我們對於西方產品比東方的技術完善、價錢低、品質好等等，只好閉起眼睛。現在，應該停止自我陶醉，向資本主義學習了」。匈共創始人之一的羅卡斯，於一九六四年一月發表文章說：「史達林所歪曲的馬克思主義，不能解答主要是由青年們提出的現代

問題，只有未經曲解的馬克思主義才能予以解答。……爲了我們年青的一代，必須要改良馬克思主義。……青年們的心裏，必須能記住新發現的技術和現代研究的成果，並進而運用它們」。他又會寫道：「由於史達林主義時代的錯誤，我們已喪失了五十年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因此，青年們懷念一切西方的東西，乃是絕對合理的事」。波蘭已故經濟學家藍格(Oscar Lange)，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首倡者。波共理論家史多華指出，馬列主義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分析有錯誤，對西方工人階級情況的敘述，常是有意歪曲；而認爲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會因爭奪市場而互相戰爭，也是忽視了資本主義世界內部愈來愈密切聯繫的跡象。馬列主義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分析，也是失敗的，因爲經過了四十餘年，馬列主義仍不能改變人類的經濟心理，「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金錢仍是幸福的尺度。這些國家的公民也同西方的公民一樣，無不在盡可能爭取更多的金錢」。就在蘇俄，A·波波娃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大學教育研究所提出的博士論文中，反對稱美國爲「華爾街獨占資本」，又說：「認爲帝國主義集團內的矛盾不斷激化，是并未考慮到帝國主義經過了各種階段，可以用像歐洲共同市場那樣的形式來解決紛爭的事實」。東柏林洪堡大學著名化學教授哈維曼，在其一九六三年十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的講義「從自然科學看哲學問題」中說：「蘇俄講壇上教授辯證法唯物論的人們，已經墮落到庸俗的機械論的地步」。「使世界上所有的自然科學家，都對辯證法唯物論發生懷疑」。「爲了真正的共產主義哲學的復興，思想自由實屬必要」。在現實政治問題上，他激烈責難當時百餘名政治犯被處死刑，而要求：(一)給東德人民較多「知的自由」；(二)不以法令、命令乃至「原則」，剝奪或限制創作自由，而給予可以依個人意志行動的社會環境；(三)開放對西方社會的精神國界；(四)從黨內驅逐鋒頭主義，阿諛及偽善份子。他又譏諷着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們，如果今後仍繼續以『法庭裁判官』的姿態裁判自然科學家，那和教皇對伽利略施以宗教裁判實無差別」。

僅僅在經濟技術方面稍稍西歐化一下，是各國共黨政權所希望的。譬如今年三月間，捷克的副總理西穆涅克(Otakar Simunek)還說：「捷克經濟明顯地落後於西方。竭力避免把東方和西方作比較的態度，早該放棄了」。然而，由學習西方的經營方式和科學技術，更進而要求思想自由，懷疑共

產主義，就不是共黨所能答應的了。於是，蘇俄東歐也就掀起了近乎「整風」的運動。

## 五

在知識份子中，作家、藝術家常常是不滿現實，要求變革的先鋒，對所謂自由相當敏感。而反史、經濟改革以及蘇俄政權的新舊交替，都給他們以可乘之機。原有自由化之稱的黑魯曉夫時代末期，莫斯科文藝界會吹起一陣寒冷之風。但新政權上台，根基未固，不能不先放寬自由，對知識份子加以安撫。隨着新政權登台的「真理報」總編輯於去年即已離職的魯米揚采夫(Aleksey M. Rumyantsev)，於去年二月廿一日發表文章，題爲「黨與知識份子」，表明了對於知識活動的「自由主義」立場，并暗斥黑魯曉夫是，「把主觀的評價，個人的好惡，作爲衡量藝術創作的標準，強使別人服從，與黨的路線毫不相干」。九月九日又發表文章，主張藝術創作活動的表現自由，指責「消息報」和「農業生活報」的藝術批評態度不當。而蘇俄作家協會的雜誌中，特瓦爾采夫斯基主編的「新世界」，和柯契托夫(V. A. Kochetov)主編的「十月」，也經常唱對台戲。這表現了蘇俄文藝界的新舊對立，而當時的新政權似乎採取「不干涉」政策。然而，當作家、藝術家進一步要求表現自由，忽視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到共黨和共產主義的威信時，共黨就不能袖手旁觀了，這在東歐亦復如是。

據傳去年十月，卅八國共黨參加布拉格舉行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卅週年紀念會時，蘇俄與東歐就祕密商討如何對付知識份子的背叛活動。本來，波蘭因爲經濟困難，進入六〇年代以來，即不斷壓制知識份子，前述的史多華即受到迫害。今年又有經濟學家巴德烏斯基、共黨史學家哈斯、華沙大學學生史密休三人，以保存、出版反動文書罪名被判刑三年。二月間，作家凱特林謝姆列因在國外發表文學作品，被判刑四年。前述東德哈維曼教授，本已由洪堡大學物理化學研究所所長，降格爲其他化學研究所系主任。最近他在西德雜誌上發表意見說：「東德應該有在野黨，使政治空氣民主化；西德也應該有民主的、不隸屬莫斯科的、民族主義的共產黨」。於是他那個系主任也被免職。同時被開除黨籍，并被剝奪「學士院院士」資格(今年三月下旬



秘密投票，按規定須有贊成票七五%，但哈氏以七〇%贊成票即予除名）。哈氏於一九三二年入黨，曾獲東德最高榮譽的「國家獎」，和因被迫與蘇俄簽訂不平等的貿易協定、憤而自殺的副總理阿培爾（Erich Apel）爲至交，在青年黨中極受愛戴，因此他的受處分也激起了極大的波瀾。現今東德在劇場、電影、電視廣播、作家、學者各方面，正進行自我批評，常常發表作品，嘲諷「醜惡之牆」的詩人維雅曼等等，都成了攻擊的目標。今年一月底，俄共中央書記安德洛波夫率團訪問東德，東德也有一個代表團訪問捷克（東德自由化受捷影響），以協調雙方的文化路線。就在自由化最早的南斯拉夫，去年夏有青年作家米海洛夫夫判刑事件，因爲他在送往國外的一篇論文裏說，早在一九二一年蘇俄就有了第一個死亡集中營，那等於暗示說恐怖統治和集中營是蘇維埃政權的特色，并非起自史達林，而是列寧時代業已有之的。去年底，兩名作家布列霍維奇描寫第二次大戰中游擊戰爭的小說「駝背上的英雄」，被指爲諷刺游擊戰，而且過於猥褻，禁止在國內出版。但巴黎、羅馬都予發行，且頗享盛名。

今年二月十四日，莫斯科宣判安德烈·辛耶夫斯基（Andrei Sinavsky）和尤里·丹尼爾（Yuri Daniel）七年及五年徒刑，并送往勞動改造營服刑，他們的罪名是分別以阿布蘭·特茲和尼古拉·阿雅克的筆名，偷運諷刺蘇俄的作品至西方出版。另一位作家華列里·塔錫斯（Valery Tarsis）則比較前二人幸運。這位六十歲的作家，也常把作品運出國外出版。他最近的一本小說「第七號病房」，即在法蘭克福一本反俄雜誌上發表，內容是敘述他本人曾被強迫接受治療的、沒有醫師、沒有護士、但「患者」因可不聽共產主義說教而自得其樂的精神病院的經驗。也許是爲了表示一下民主、堵塞一部分責難者之口，他在前述二作家接受審訊期中，獲准於二月九日前往英國訪問。但他一到倫敦，就說共產主義的本來面目，就是警察法西斯，這個政權將在五年或六年中被推翻。又說蘇俄政府恐怕根本就不想讓他回去。果然，蘇俄立即褫奪了他的公民權，而他也向西方要求庇護。

蘇俄作家判刑，引起很多不良反應。國際寫作協會曾致函柯西金，對這種野蠻和不人道的宣判表示震驚。二月廿一日法新電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一二五人，聯名致函柯西金，要求撤銷該項判決，以增進美蘇關係。日本作家也擬議營救判刑作家。甚至英、法、奧、比、芬、丹、瑞典、義等

蘇俄與東歐的知識份子

國的共黨也群起責難。英共總書記約翰·高蘭（John Gollan）說：「這件事的處理，其對蘇俄的損害，比辛耶夫斯基和丹尼爾的文字，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上，一位共黨作家寫道：「因作品內容而剝奪兩個作家的自由，那是創下一個比該等作品本身，對社會主義更爲有害的先例」。據報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也有四十名青年作家，寫文章對此事提出抗議，且幾乎釀成一次示威。

跟着，二月廿五日「紅星報」又報導總政治部主任葉彼雪夫在軍人和文化人的集會上攻擊「新世界」主編特瓦爾采夫斯基，因該刊掲載布依柯夫小說「死人并不苦惱」，書中主人公在戰時受毫無作戰經驗、只有軍法審判功績、被士兵認爲比敵人更可怕的魔鬼的長官所虐待，迄今仍爲惡夢縈繞。葉彼雪夫則難那些只暴露二次大戰「黑暗面」，尤其是最初數月蘇俄敗北的「否定的」作品，要求作家在作品中捨棄「和平主義」。

蘇俄東歐文化政策的收緊，大致是從去年底開始，各國幾乎一致。只是急圖經濟改革的捷克，和以往在文化上把門關得太緊的羅馬尼亞，倒有些開放之勢。

## 六

在去年十月的布拉格會議中，似乎也談到了反史問題。共黨政權所担心的，是反史所造成的一種印象，使人們認爲崇拜偶像的醜態，與共產主義是不可分的。

對反史問題首先重予評價的當然是蘇俄，因爲反史不僅在國內造成混亂和新舊派的對立，更在國際共黨中降低了俄共的領導地位。當布里茲涅夫於去年蘇俄對德戰勝紀念日演說中，初次重提史達林的名字時，聽衆中有很多人在拍手。跟着，史達林的照片陸續出現，歷史學家在著書中，對他給予比較「公正」的評價，他所著「民族問題」「列寧主義問題」，也將再度出版。「真理報」甚至以極不顯著的方式，爲史達林文藝政策執行人日丹諾夫舉行紀念。不過，俄共的態度相當慎重。它於同時，對托洛茨基的功過，也予適當評價，對布哈林的「共產主義入門」一書，也將予以重刊，以爲掩飾。就蘇俄當前的需要言，是在經濟領導方面放寬，在思想領導方面加強；

提高黨的權威，以防知識份子隨着經濟改革而提高其思想上西歐化的傾向。因而在廿三次大會中，取消主席團而恢復政治局，改第一書記為總書記，且恢復了以往的黨代表會議制度，其動機即在於此。不過，對史達林雖可重新評價，要恢復史達林主義是不可能的，所以當莫斯科市黨部第一書記葉哥里契夫，在大會支持布魯恢復總書記、政治局等的演說時稱：「近來搜求史達林主義復活的徵兆一事，極為流行。但是各位，這是徒勞的」。而布魯本人

的演說，則根本未提到史達林的名字。  
儘管如此，於大會之前，蘇俄高級知識份子包括大物理學家加比察（Petr Leonidovich Kapitsa）和跟蘇俄政府關係極深的茹可夫（George Aleksandrovich Zhukov）在內，聯名致函俄共中央，阻其為史達林翻案。莫斯科紅場且舉行反史遊行，連青年作家阿克曉諾夫也被抓進警署，不過不久即獲釋放。至於東歐共黨政權，雖然也提防反史會變成反共產主義，但對於恢復史達林主義，恐怕也心懷戒懼。

至於蘇俄當前對知識份子採取什麼態度呢？今年五月廿二日莫斯科廣播，把知識份子分作三類。它說：知識份子的優秀部份，總是同人民在一起，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教導人民，自己也向人民學習。但是有一部分知識份子，由於各種原因，可能跑到敵人一方面，落到反革命陣營裏。在這一部分人中，有明顯的敵人，他們惡毒地詆蔑自己的人民，去為反革命服務。但也有被敵人欺騙的宣傳所迷惑的人。對待這些迷途者，應當與對待明顯的敵人不同，革命的政權應當爭取他們，把他們吸引到人民一方面來。而布里茲涅夫在廿三次大會報告中，雖然提出黨反對以行政和專橫方式，解決文學和藝術的意識問題。但同時強調共黨仍將繼續指導創作活動。又該次大會中「自由主義」派象徵特瓦采夫斯基的候補中委，史達林主義的代表柯契托夫的檢委，同時落選。這些都可暗示俄共今後在文化政策上，要採取一種「中間道路」，以符合它向資本主義學習，但不向資本主義復辟，也可說是技術共存，思想不共存的當前要求。大致說來，東歐也亦復如是。

然而知識份子本身又如何呢？據西方導報：捷克知識份子的基本論調是：構成國家的是個人，其次才是國家。華沙大學哲學教授阿丹霞夫在所著「馬克思主義與個人」一書中，認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可對馬克思見解抱有批判的意見，那樣的社會要最尊重個人自由。今年二月「朝日新聞」記

者小島亮一報導，波蘭的言論沒有印刷的自由，僅有口談的自由。但因爲他是巴黎外國記者協會副會長，曾在波蘭新聞協會過了一天。據稱那裏的宴會席上異常喧囂，人們一面呼口號一面大喝伏特加。不久酒酣耳熱，大呼「新聞自由萬歲！」「小島君！打倒官僚！」「打倒官僚」是共產集團自由文化人的口頭禪。小島會參觀布拉格電視台電視短劇試演，對機械化、統一化的近代人生活，予以諷刺，對強行統一化的官僚予以戲弄。

共產黨要文藝作家把社會主義醜惡的黑暗的現實，加以美化、描寫成光明的，那本來就違反了現實主義的精神；它們要知識份子鼓吹企業方面的主動精神，而不許他自己有主動精神，也是一項根本矛盾。蘇俄東歐的知識份子中，保守派尚佔有優勢。那些所謂「自由派」份子，也只是要求把馬列主義現代化，能有創作和表現的自由，除了極少數例外，他們并未反共，也沒有完全反對社會主義實現主義。但是，當共黨當局要他們向前伸出左腳時，他們不會把右腳也邁出去而繼續前進呢？那將是共黨政權所極感不安的！

（註）匪「人民日報」於今年五月十三日發表「蕭洛霍夫的叛徒真面目」、「『一個人的命運』——現代修正主義文藝黑旗」，三十日發表「蕭洛霍夫訪日爲『蘇日合作』反華效勞」等文章，斥其爲修正主義叛徒，對其「靜靜的頓河」責爲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其短篇小說「一個人的命運」，亦被指爲「販賣和平主義，反對革命戰爭」，「兜售活命哲學，美化叛徒懦夫」，「爲帝國主義服務的『新路線』」。又一九三三年諾貝爾文學獎金，曾授與蘇俄作家蒲寧（Ivan Alekseevich Bunin），他早於一九二〇年逃往巴黎。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又頒給帕斯特納克，他被迫放棄獎金，並於一九六〇年抑鬱而死。匪報會引此證明諾貝爾文學獎金是「一種保留給西方作家和東方叛徒的榮譽」（法作家薩特語），而蕭洛霍夫就是「東方叛徒」。

		歡
	指	迎
	導	
批	評	
訂		
閱		